

《典论·论文》与九世纪初日本文学诸问题

——基于“文章经国”思想的考察

郭雪妮

内容提要 古代日本人最早接触《典论·论文》是通过李善注《文选》，这就意味着审察《典论·论文》在日本的影响首先不能忽视唐代“文选学”所起到的媒介作用。曹丕对“文”的自觉与唐人驰逐文华之风习互为明暗，共同影响了9世纪初日本接受《典论·论文》的方法——以“文章经国”为要义。《典论·论文》既是“文章经国”思想的元文本，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专论，其对“文”之自觉及论“文”范式，潜移默化影响了9世纪初日本人对文学起源、发展及本质、功用等问题的思考。《经国集》序对中国文学所作的判断就是基于这种思考的最初成果。在这层意义上，《典论·论文》不仅是中国文论之嚆矢，亦可视为日本文论之渊薮。

关键词 《典论·论文》；文章经国；日本汉诗；影响研究

9世纪初日本朝廷先后敕撰了三部汉诗集——《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和《经国集》（827），合称“敕撰三集”。敕撰国史、律令虽有前例，但奉敕编撰汉诗集不仅属首创，且无后继——以《古今和歌集》为转折，10世纪后，日本敕撰文学的重心很快就转向了和歌集。“敕撰三集”以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章经国”思想为理念，以期在中央朝廷形成一种政治凝聚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章经国”作为9世纪初日本朝廷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逐渐成为日本学界定说。^[1]美国学者从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等层面也加入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2]近年来，学界热衷于讨论曹丕“文章经国”思想在日本接受过程中的“空洞化”与“抽象化”问题，其间不乏学者质疑“敕撰三集”中收录诗文与“经国”理念的背离。^[3]

笔者以为，如果将曹丕《典论·论文》之于9世纪初日本的启示性意义，仅归结为一个“扁平”的文学口号或“空洞”的政治理念，则无疑削弱了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典论·论文》因收入《文选》而得以保存，唐人诸种《文选》注本在古代日

本的流布，说明日本朝廷所标榜的“文章经国”思想其实离不开唐朝文治政策的影响。其次，先行研究大多忽视了《典论·论文》作为文学批评文本的属性。曹丕对“文”的自觉及以《典论·论文》为代表的中国文论的大量传入，促生了日本文学批评意识的兴起，这既是空海《文镜秘府论》诞生的学术背景，也为即将到来的“歌论”时代做了良好的铺垫。本文拟从上述问题切入，通过对“敕撰三集”序文做比较诗学的考察，重点研究《典论·论文》在9世纪初日本的接受与日本文学批评意识的兴起问题，以期为中日学界的“文章经国”思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 从唐人注《文选》到《典论·论文》的传入

《典论》是魏文帝曹丕（187—226）立言以垂典范于后世的精心之作，约作于建安末年，至宋代亡佚。《论文》是《典论》中论述文人、文体及作文的名篇，因被萧统编入《文选》而得以传世。古代日本人对《典论·论文》的接触，从《正仓院古

文书》收录的《文选》卷52残卷来看，主要是通过李善注《文选》。该残卷选抄了李善注《王命论》《典论·论文》等篇章，从纸背记录可知是由志斐连麻吕抄于天平17年（745）。^[4]正仓院文书中类似残卷及写经记录保存颇为丰富，另有平城宫出土木简亦可作证《文选》在奈良朝之普及。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编《平城宫木简》中，收录编号为688、689、696、764号的木简上，反复出现“臣善”“臣善言”等字样，东野治之由此判定李善注本在奈良朝已颇为流行。^[5]《日本书纪》《怀风藻》《万叶集》等奈良朝最初编纂的一批文史著作，皆可见《文选》之影响。

曹丕《典论·论文》（后文简称《典论》）首次出现于日本文献，是在弘仁5年（814）菅原清公等文臣奉敕编撰的第一部汉诗集《凌云集》序开篇：

魏文帝有曰：“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信哉。伏惟，皇帝陛下，握哀紫极，御辨丹霄。……爰诏臣等，撰集近代以来篇什。^[6]

该序文由嵯峨天皇近臣小野岑守执笔，他将曹丕观点置于篇首，不仅有修辞效果，更有彰显以中国文学理念为正统的意味。“信哉”二字重申以“文章经国”作为整部诗集的编纂理念，其后赞颂嵯峨天皇治世贤明、才思富赡以及奖掖文艺之盛举。

弘仁14年（823），嵯峨天皇退位，淳和天皇承继其兄之流风余韵，于天长4年（827）敕命文臣滋野贞主等编修《经国集》——诗集命名直接取意“文章经国”。滋野贞主为《经国集》撰写总序，该序不仅有“魏文《典论》之智，经国而无穷”的评价，更有对《典论》原文的大段引用，如：

夫贫贱则悒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口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7]

9世纪初日本为何如此重视曹丕的“文章经国”？以笔者拙见，厥有两种“媒介”不应忽视：其一是《典论》收录于诗文总集之弁冕的《文选》，其二是日本人接受的《文选》多为唐人注本。《文

选》在8世纪流入日本，9世纪初日本人对《文选》的释读已经相当深入。空海在《文镜秘府论》中甚至能对《文选》之取舍进行评鹭：“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然于取舍，非无舛谬。”^[8]空海曾随延历23年（804）的遣唐使团入唐，这批使团由大使藤原葛野、副使石川道益、判官菅原清公总领，三人均为“敕撰三集”诗人。判官菅原清公尤重诗文，回国后成为朝廷重臣。弘仁10年（819）正月，菅原清公“加正五位下。兼文章博士，侍读《文选》。兼参集议之事”^[9]。菅原清公为天皇讲读的《文选》究竟是哪一种抄本，已经不得而知，但从其在平安初期的流布情况来看，多为唐人注本应是不争之事实。

隋唐二代，勒成专书的《文选》注释著作有10种，^[10]这些著述发掘了《文选》本身的文章学内涵，其影响远播东亚各国。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流入日本的《文选》文献有：“萧统《文选》30卷、李善注《文选》60卷、李善《文选音义》10卷、公孙罗《文选钞》69卷、公孙罗《文选音决》10卷、释道淹（即许淹）《文选音义》10卷、曹宪《文选音义》13卷，等等。”^[11]这些文献主要来自曹宪及其弟子李善、公孙罗、许淹，它们既是《文选》讲授在唐朝公私门学大兴的佐证，也是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要学问的“《文选》学”走向兴盛的最初成果。

唐人注《文选》全本流传于今的只有李善、五臣两种注。唐显庆3年（658），李善将《文选注》60卷献与高宗。至开元6年（718），五臣重注《文选》并将其献给玄宗。据说五臣注的出现是因玄宗皇帝不满李善注“唯见引事，不说意义”，五臣投合玄宗留意《文选》的心思，为自己打造的晋身之阶。^[12]在五臣注之后，玄宗的文学喜好又影响了萧嵩、王智明、李玄成、陆善经等人对《文选》的续编与注释。日本大规模地摄取唐文化，恰是在玄宗朝入唐的三批遣唐使——分别于养老元年（717）、天平5年（733）、天平胜宝4年（752）入唐，但五臣注《文选》却没有出现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相较之下，平安朝知识阶层对李善注本相当熟悉，日僧圆仁入唐行经扬州白马寺时，曾在日记中

特意记载李善在此注书之事：“开成三年十一月廿九日。扬州有卅余寺……法进僧都本住白塔（寺）。臣善者，在此白塔寺撰《文选注》矣。”^[13]

然而，唐代曹宪、李善一系的“《文选》学”，本质上是一种注重章句注疏的学问，与《文选》在文学一途之影响不能混举。《文选》作为文学创作之典范备受推崇，是在唐代科举选才标准逐步倾向文辞，世风驰逐文华之际。尤其是在高宗朝，诗赋逐渐渗入进士科应举，《文选》也成为士子必读书目。日本既仿唐建立学制，自然也将《文选》列入应考书目，尤其在进士科考试中，《文选》与《尔雅》的背诵、释读几乎是必考内容之一。如《考课令》规定：“凡进士，试时务策二条。帖所读，《文选》上帙七帖，《尔雅》三帖。其策文词顺序，义理慥当。并帖过者为通。事义有滞，词句不伦，及帖不过者为不。”^[14]《选叙令》曰：“进士，取明闲时务，并读《文选》《尔雅》者。”^[15]

在神龟5年（728）七月及天平2年（730）3月的学制改革中，日本又在明经科之外增设文章科。文章科系模仿唐弘文馆、崇文馆等贵族子弟学校而来，因此大学寮在选拔文章生时，也效仿唐朝以诗赋取士。如《延喜式》规定：“凡补文章生者，试诗赋，取丁第已上。若不第之辈，犹愿一割者，不限度数试之。”^[16]文章生还要在频繁举行的宫廷诗宴上，与其他诸司官僚一起奉召赋诗，因此暗诵《文选》成为时代风潮，如《文德天皇实录》藤原诸成卒传中特意记载他能背诵《文选》之事：“弘仁年中，为文章生。聪慧超伦。暗诵文选上帙，学中号为三杰。”^[17]总之，在奈良朝至平安朝的学制改革中，作为“辞章之圭臬”的《文选》，成为了选拔官吏的教科书，具有着“准经”的权威地位。

尽管日本人接受《文选》时，初唐以来《文选》在学术与文学之间的区隔已经消弭，它只是为好文者所览诵的文学总集，但日本人以“诗赋”为中心的文章观念的形成，却是在引入唐朝选拔官吏的考试中，沿袭唐人研习《文选》的方法而来。如初盛唐诗人借鉴《文选》的范围集中在诗、赋、骚、辞部分，而以“文章经国”理念为指导编纂的“敕撰三集”，主要收录的也是吟赏风月的诗、赋。因此有学者指出，平安朝提倡的“文章经国”，其

“文章”与其说是指与律令制国家“经国”相关的章、奏、表、议、铭、诔等，不如说是接近于纯文学的诗赋。^[18]

通过“诗赋”考试选拔出的文章生，基本都成为了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官僚。因此，平安初期政坛的重要人物大都兼具宫廷文人与国家官僚的双重身份，他们通过文学活动参与朝政，因此学习文之典范的《文选》，自然就被视为是“经国大业”，这一倾向一直延续到平安朝中期。如菅原文时在天庆4年（941）3月的《文选》竞宴诗序中说：

翰林江学士（大江维时）大夫，始授文选于诸生，盖朝议也。夫昭明太子之撰斯文也，驱七代之人英，搜千载之鸿藻。……取而集之，名曰文选。诚是经国大业，化俗之基者也。^[19]

诗序中提到的“大江维时”，来自平安朝《文选》讲读世家大江家。当时日本宫廷流行《文选》讲读与竞宴，并持续了很多年，《菅家文草》《扶桑集》等诗文集都收录有《文选》竞宴诗。《文选》序文中提倡的“文之时义远矣哉”，也深刻影响了日本人对“文”的态度。如《经国序》云：“是知文之时义大矣哉！”^[20]空海《文镜秘府论》天卷序曰：“是知文章之义，大哉远哉！”^[21]这是理解9世纪初日本“文章经国”思想的基础。

二 日本文人接受《典论·论文》之方法

曹丕《典论》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开篇，在全篇近600字的短文中，论述作家才性与文体、文气之关系，以及文章的价值功用等问题，尽管有些观点还只是引其端绪，但已约略涉及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若干主轴问题，因此被视为“自《毛诗序》以来最重要的文论作品”^[22]。平安初期日本对《典论》的接受，整体上以其论文章功用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重点，这一观点不仅反复出现在“敕撰三集”序文中，还可见于9世纪初的僧侣及女性文学中。如空海《文镜秘府论》“天卷”序云：

夫大仙利物，名教为基。君子济时，文章

是本也。……孔宣有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迹之事父，远之事君。”……是知文章之义，大哉远哉。^[23]

《文镜秘府论》约成书于弘仁11年（820），空海与嵯峨天皇、小野岑守、滋野贞主等“敕撰三集”诗人交游密切，他将密教与国家政治密切结合，在论述密教镇护王权的基础上，纳入儒家的“文章经国”思想，因此空海虽然是僧侣身份，但无疑也属于平安朝“文章经国”的文学圈。

“文章经国”思想还可见于这一时期的女性斋院文学。弘仁14年（823）2月，嵯峨天皇行幸有智子内亲王斋院，并以《春日山庄》为题令群臣探韵赋诗。皇女有智子内亲王写下一首七律歌咏皇恩浩荡，天皇赞赏其才华曰：“忝以文章著邦家”^[24]，并当即授予有智子内亲王三品官位，赐封百户。嵯峨天皇让位以后，有智子的诗作骤减，这不仅是时代剧变、诗风革新的结果，对于在“文章经国”时代成长起来的有智子而言，诗文既不是消闲的工具，也不是“言志”的手段，而是用于“君臣唱和”的经国文章。^[25]随着嵯峨天皇及其近臣们淡出文坛，“文章经国”的时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从文学接受史的角度看，9世纪初日本对曹丕“文章经国”理念的提倡与标榜，在中、日两国的《典论》接受史上都显得极为特殊。就中国而言，从曹丕撰写《典论》到被萧统编入《文选》，甚至在《文选》流传之后，曹丕《典论》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初期资料，虽然也会被提及——最重要的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论述^[26]，但以曹丕“文章经国”思想总领一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理念的情况并不常见。何况就现行流通的《典论》文本来看，我们不能否认，其主旨与精华并不止于“文章经国”一处，毋宁说关于“文人相轻”所占篇幅最多，从开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直到“唯通才能备其体”，包括五个自然段，且论述周备。相较之下，“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仅有一段。关于这一点，前贤们已有深厚研究。^[27]如郭绍虞认为，《典论》所讨论的“不外是文体和文气的问题”。王运熙也将《典论》内容分为“作家论”“文体论”“文章功用论”三部分。台湾学者同样将“作家”“文体”“文气”“立言不

朽”作为《典论》论述的重心。

然而，9世纪初日本在接受《典论》的过程中，显然对“文章经国”进行了夸大化阐释。学界认为这主要是嵯峨天皇喜好诗文的结果，理由是：嵯峨天皇与魏文帝曹丕身份地位相似，且醉心于汉诗文创作，在嵯峨天皇的倡导之下，“文章经国”思想被作为国家的文化政策而推行。^[28]以上研究虽不乏依据，但几乎都是从“接受者=日本”的立场出发追溯渊源，却鲜有人从中国文学的立场出发考察影响的放送者——曹丕《典论》本身，毕竟《典论》并非专述“文章经国”，兹就《典论》中占有重要篇幅的“作家论”和“文气论”为例，细绎史乘，以证疑问。

《典论》首论作家，然后始略及文体及文学理论，这是初期中国文论的一般特色，颇受东汉以来人物评论之影响。曹丕指出“文人相轻”现象的根源之一是文人的“不自见之患”，其二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而文人又多以己之所长，“相轻所短”。接下来，曹丕还对当时的著名文人分别做了评论，指出其长短。同时对每一种文体予以理论化，抉出其本质。曹丕对作家才性与文体特征之间关系的论述，和汉魏之际政治学术思想的变迁直接相关。^[29]从汉末到三国，是中国社会空前大破坏的分裂时期，各种政治势力都在网罗人才。因此当时对人物才性的品评，实际上是直接为政治需求服务的。正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才推动了对人才的批评与研究，于是就有了中国古代第一部专述人才问题的著作——刘邵的《人物志》。

在推崇曹丕《典论》的初期平安朝，比起对作家创作优劣的批评，更多需要的是一种平均化、程式化的创作，因为创作活动的中心只有绝对权威的天皇，“敕撰三集”所录诗文多为“君唱臣和”之作，这些应制诗、奉和诗既不需要张扬作家的个性，也不需要情感、志向的过度抒写——更何况这里假设的前提是，他们能够使用汉语这一外来语自由抒写个人意志与情感。了解“敕撰三集”中诗作诞生的场合，就很容易明白他们难以与“文人相轻”这一命题产生共鸣的原因。“敕撰三集”中近八成以上的诗赋都是在公宴上创作而成。这些诗赋从内容到形式，从时间到地点几乎都有严格的规

定。比如题目,一般由天皇或诗宴的中心人物命题,在座臣僚宾客就以“和……”“奉和……”“同和……”为题,在一种颇具游戏竞赛的氛围中同题赋诗。有时则由诗宴主人分题,在座诸人各赋一物,以“得……”或“赋得……”为题赋咏。诗赋形式一般通过用“韵”来规定,如和韵、次韵、勒韵、赋韵等,有时诗题、用韵甚至作诗的时间都被限制,以增加诗宴的趣味性。这种情况下创作的诗赋,在结构、主题上呈现出高度的程式化,个人的真实情感和政治抱负大多被摒弃,代之以对修辞和典故的崇尚与追求。

松浦友久指出,这些诗赋作为公宴中的重要环节,并不需要诗人们抒写自我或感怀言志,他们只是在一种游戏的气氛中,利用分得的题目,接受形式上的制约,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展示知识教养而已。^[30]后藤昭雄则从身份制的角度指出,“敕撰三集”中诗歌的排列顺序依据的是作者的身份、官位,如《凌云集》中依次收录的是平城上皇、嵯峨天皇、淳和天皇、从三位参议藤原冬嗣、从三位长陆守菅野真道、从五位下但属皇族的仲雄王、从四位下播磨守贺阳丰年等人的诗作。这就说明“敕撰三集”的诗歌排序,并非按照诗人在文坛的影响力或诗歌的优劣,而是遵循律令制国家的身份制度。^[31]过度秩序化的宫廷文学环境,需要的是统一规范的艺术,而非具有个性的作家。

其次,曹丕论述了“文以气为主”的问题。“气”是上古中国的一个重要理念,最早是指物质性的“有形云气”,后被引申于哲学范畴,用来指“宇宙的本原之气,也即元气”,或指人的生命、精神。关于“气”的概念与范畴的研究,学界已有不少成果。^[32]曹丕最早将“气”的观念引入文学批评,如李泽厚说:“虽然气的观念很早以来就和中国古代美学相关,但最为明确地把美学建立在气的理论基础上,以气的理论来贯穿统帅美学理论,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33]关于曹丕“文气”说向来众说纷纭。^[34]朱自清认为,曹丕言“气”实则是关于人的“性情”。朱东润认为是就“才性”而言,郭绍虞则从阳刚、阴柔之气的不同出发,认为“气”总关人的“个性气质”。徐公持说:“曹丕所说的气,当指人的气质、禀赋,文以气为主,这

就是将作家的气质、禀赋视为文的风格面貌的决定性因素。”^[35]要之,曹丕的“气”多被理解为艺术家所具有的气质、个性、天才。如曹丕称“孔融体气高妙”“徐干时有齐气”“公干有逸气”等,都是以“气”发论的作家批评。

中国关于“气”的著述很早就传入了日本。“气”在日本有两种写法,即“氣”和“氣”。“氣”字使用的较早,在17世纪以后逐渐被“氣”字取代。“氣”不仅是对中国“氣”字的简化,也是对其有意识的改造与改写,这与“气”字在中国的复杂演变史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气”字有“け(ke)”和“き(ki)”两种发音,“け”较早,“き”较晚,因此在《源氏物语》中,主要使用的是发音为“け”的“氣”字。^[36]日本学者赤塚行雄通过对日本古典文学中的“气”的探究,指出《源氏物语》中的人物对身体以外的一些超自然、超感官的存在,如灵、魄、鬼、怪、疾、异等“物”,普遍具有一种不可把握的神秘感和恐惧感,日本人将它们都读作“もののけ”,文字表记为“物の怪”或“物の氣”。如《源氏物语》中的“物の氣”多数都写作“物の怪”,此处“怪”和“氣”的读法一样,都读作“け”。要之,在古代日本人的意识中,“气”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令人畏惧的神秘性存在。^[37]《经国集》序虽有“紧健之词,体物殊耸。清拔之气,缘情增高”^[38]的论述,但也只是原样摘用陆机《文赋》而已,并没有特别展开说明。随着时代下移,“氣”在日本的读音与内涵逐渐发生变化,至13世纪藤原定家撰写歌论书《每月抄》时,才开始将“气”引入日本歌论。

三 “文”的自觉与“中日同源”文学史观的成立

9世纪初日本对《典论》的接受主要以“文章经国”为中心,这是就《典论》的内容而言,但我们不能忽视《典论》作为“文学批评”这一范式对日本之影响。曹丕不仅首次提出了“文章经国”思想,更是将“文”之重要性理论化的第一人。自《典论》始,魏晋文人专门论文的篇章忽焉勃兴。《文心雕龙·序志》云:“详

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珣《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39]曹丕开创了论“文”之范式，其后有曹植《与杨德祖书》、应珣《文质论》等出现，可知论“文”在建安时代已经形成一种风气。^[40]晋朝自陆机《文赋》出现以后，专门论文的著述和文集编纂的著作日益增多，如李充《翰林论》、挚虞《文章流别论》等，直到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的成书，终于迎来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期。

以曹丕《典论》为代表的中国文论作品，其对“文”的自觉引发了平安初期文人对诗歌缘起、本质、功能等问题的思考。兹以与《典论》最为密切的《经国集》序为例扼要钩玄。《经国集》原有20卷，今仅存6卷。收录有诗、赋、序及对策文，内容较《凌云集》（1卷）和《文华秀丽集》（3卷）之和，亦堪称庞大。从《经国集》的编纂方针来看，它大有超越《凌云集》和《文华秀丽集》的雄心，其序文不仅是一篇总序，还具有给天皇上表的正式文书的性质。^[41]就是这篇近似“上表文”的序文，开始大量征引中国文论，这与奈良朝偏重引用中国经史类文献显示出不同的趣味。

一般说来，早期日本人在接受中国典籍时，并不严格区分文学总集、史学著作与地志文献，因此日本早期的史书、地志如《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等，就与汉诗集《怀风藻》共享着《文选》《史记》《汉书》《世说新语》《艺文类聚》等文献库。但这并不意味着上代日本人没有“文学”的概念，《怀风藻》作为诗文集的成书就是最好的证明。毋宁说这一时期中国典籍传入数量的相对有限，决定了早期日本接受中国文学之方法。进入平安时代，这一情况发生了转变。藉遣唐使往来东亚海域之便，中国六朝至初盛唐的诗文集开始大量流布日本，日本文人可以直接取径中国文学作品。因此平安时代的汉诗文，至少是在大量参考中国诗文集并对文学概念萌发出自觉意识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

从现存资料来看，9世纪初日本人对文学形式、诗赋理论的关心是显而易见的。仅《日本国见

在书目录》“小学家部”记载，就有钟嵘《诗品》3卷、杜正藏《文轨》10卷、《文谐》20卷、《文章体式》9卷、《文章式样》1卷、《文章仪式》1卷、《文章论》1卷、《文章要诀》1卷、《文章释杂义》1卷、沈约《文章四声谱》1卷、《诗笔体》1卷、《文笔要诀》1卷、《文笔式》2卷、《属体法》1卷、元兢《诗髓脑》1卷、《诗格》3卷、《诗病体》1卷、《文笔范》1卷、《文章始》3卷、《文章故事》1卷、《诗体》7卷、《古今诗类》2卷、《唐朝新定诗体》1卷等40多种相关文献。^[42]另外还有《切韵》5卷、《唐韵正义》5卷、《音谱决疑》10卷等韵书的存在。正是因为有这些文论文献与韵书做素材，才诞生了空海的《文镜秘府论》。与《文镜秘府论》几乎同时编纂的“敕撰三集”，其序文对中国文论文献的使用空前密集，远胜于《怀风藻》时代对中国经学、史学文献的偏重。如《经国集》序开篇云：

臣闻：“天肇书契，奎主文章。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知得失。”故文章者，所内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且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譬犹衣裳之有绮谷，翔鸟之有羽仪。……而沿浊更清，袭故还新。必所拟之不异，乃暗合乎曩篇。夫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口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43]

其中论文章本质时引挚虞《文章流别论》“故文章者，所内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以强调文章的人伦与王泽教化作用。言及文辞藻饰之美时的“譬犹衣裳”句，化用钟嵘《诗品》“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绫縠”，说明文辞之于文章的重要性。谈论创作的继承与创新问题时取陆机《文赋》“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以及“必所拟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论及文章功用时，“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云云，则是大段取自《典论》。

《经国集》序将《典论》《文章流别论》《文赋》《诗品》《文心雕龙》等中国文论中浑然一体的七宝楼台拆成碎片，从中拣取自己需要的片段为文集

作序,类似手法亦可见之于《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序,但《经国集》序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试图利用中国文论术语拼接、镶嵌、重组出日本文学史的起源。与《怀风藻》(751)等诗集序模仿《文选》序的写法,从“斯文未作”起笔,讲述文字、文章的起源不同,《经国集》更接近于唐人诗集序的写法,重点论述文章的功能、性质及文学史之发展,这与《怀风藻》序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如此陈述“文”在日本的起源:

逃听前修,遐观载籍。袭山降辇之世,檀原建邦之时,天造草创,人文未作。至于神后征坎,品帝乘乾。百济入朝,启龙编于马厩。高丽上表,图鸟册于鸟文。^[44]

《怀风藻》序以《文选》序为范本,仿其规范与用语这点已是学界共识。^[45]《怀风藻》序从天孙降临、神武天皇建邦开始叙述,将“文”的起源追溯至远古的神代日本。序文撰者显然是希望显示大和朝廷幻想中的文化优势,故而颇为巧妙地将“文字”这种人造之文的成果,解释为自古以来已经存在于日本列岛。换言之,日本的文字、典籍不是从文化“上国”中国输入的,而是起源于神代日本的宇宙的一种自然显现。《怀风藻》序还将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起源阐释为“神功皇后征伐三韩收还”,该事迹详细记载于《日本书纪》卷9,日本被描述成了一个征服三韩的大国形象。^[46]

《经国集》序没有过多阐释“文字”的草创与“文章”的起源,而是直接切入文学史的陈述,它也没有将日本文学视为能够脱离中国影响的独立存在,而是在对中国文学发展规律进行叙述的脉络上寻求日本文学的起源。这种中日同源的文学史观,实为“国风暗黑”时代日本文学思想之一大特色。尽管它是一段拼接、重组中国文论之后的文本:

楚汉以来,词人踵武。洛汭江左,其流尤隆。扬雄法言之愚,破道而有罪。魏文典论之智,经国而无穷。是知文之时义大矣哉。齐梁之时,风骨已丧。周隋之日,规矩不存。而沿浊更清,袭故还新。必所拟之不异,乃暗合乎曩篇。^[47]

这是日本现存文献中关于中国文学史所作的最早论述。“楚汉以来”四句,言战国秦汉、魏晋南

朝人文之盛。“扬雄法言之愚,破道而有罪”一句,实不知其出处,固释义不免分歧。但从其对句“魏文典论之智,经国之无穷”来看,序文作者对曹丕“文章经国”之“文章”的理解,主要在于扬雄所否定的“辞赋”一道。“齐梁之时,风骨已丧”之后,都是对中国文学史发展的评论,这些论述多出自唐人诗集序。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日本首篇讨论中国文学史的文献,内容虽笼统简约,但这种文学史观的生成令人颇感兴趣。我们不禁要问,滋野贞主为何要先讨论中国文学史?

在东亚汉文化圈内,早期各国的文学史书写并不能自由地挑选自己的起源,而是从一开始就纠缠于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和丰富遗产中。同样,日本文学也是在中国文学的概念、文体、修辞和词汇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早期叙述日本文学史的文献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即如何应对中国文学的绝对影响,并以这种巨大的外来影响源为前提,在接受与对抗中构建日本文学史的传统。更何况,“敕撰三集”时代的日本文学,其实是以汉诗文为主体的,它既是日本文学的一部分,又具中国文学之特征,这种二重交错的特殊性构成了日本汉文学——也是日本文学的开端。

《经国集》序探讨“齐梁周隋”以来的中国文学,意图或在将日本文学的起源置于以中国为圆心的世界文学坐标中。这种国际性的文学史观也决定了日本文人对中国文学进行批评时的态度,即没有将中国视为日本的“他者”,而是自然地将中国解释为日本文学在线性历史上的“源头”,这与空海在《文镜秘府论》总序中对中国文学的批评态度基本一致:

游夏得闻之日,屈宋作赋之时,两汉辞宗,三国文伯,体韵心传,音律口授。沈侯刘善之后,王皎崔元之前,盛谈四声,争吐病犯,黄卷溢筐,绀帙满车。^[48]

与《经国集》序重在宣扬“文章经国”不同,《文镜秘府论》原为解决日本人作汉诗文之声病,因此更注重对“四声”“病范”等问题的论述。但看空海评论屈原、宋玉、沈约等中国文人,完全不是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介入,而是“地道地分析阐释中国的文化。展示着他深厚的汉文学修

养,似乎把自己融入到汉文化之中。”^[49]松浦友久也说:“上代文学史中的自我意识一般是不做区分的,这一时期作品对中国文学的批判和抵抗的心情几乎看不到,这与其后《古今和歌集》假名序赋予和歌极高的地位不同。”^[50]

《经国集》序在论述中国文学史之后,以“方今”二字,将论述视角引入日本文学的现状:

方今梁园临安之操,瞻笔精英。缙绅俊民之才,讽托惊拔。……皇帝敷主,受昭华而德隆。共勉积学之添明,固要博文之助道。慧性并懋,天才俱聪。雅操飞文,似两龙之分烛。与寄擒藻,疑双曦之齐晖。紧健之词,体物殊耸。清拔之气,缘情增高。……^[51]

这里借梁园文人雅集的典故,指出日本当今的文学盛况不亚于梁园。其后引用陆机《文赋》、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作品,借“兴寄”“擒藻”“紧健”“体物”“清拔”“缘情”等中国文论术语,品评嵯峨、淳和天皇时代的文坛盛况。这种消除中国、日本文学之界限的表述方法,实为9世纪初日本文坛之特殊景观。10世纪初,以《古今和歌集》的编纂为契机,日本敕撰和歌集迎来彬彬之盛,兼之随着歌合、歌论的发达,逐渐形成了独具日本特色的歌论术语与歌学体系,然而早期的和歌批评依然可见中国文论之影响。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学理论、文学史写作模式的冲击下,日本形成了新的“国文学”概念。但近人撰写的日本“国文学史”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以“敕撰三集”为代表的那些汉文学作品。

结 语

一种文学理论命题的提出,必有其历史原因。用“文章经国”衡之于平安初期文学史、政治史,实有着足资佐证的根据。它不惟在理论表述上不是一种孤立现象,而且在东亚政治舞台上都不可或缺。9世纪初日本朝廷标榜的“文章经国”,从表面上看是取自曹丕《典论》,实则是在日本全面导入唐朝文化制度、沿袭唐朝崇尚文华的国际语境中实现的。汉诗文在东亚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国使臣通过竞聘文华夸饰自国文化的优越性,“文章

经国”思想由是为东亚各国所共有。但随着唐帝国的衰落,东亚政治格局迎来巨变,汉诗文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外交舞台,而演变为一种知识、修养甚至余技,“文章经国”思想的基础也就变得不那么牢靠了。然而,曹丕《典论》之于9世纪日本的意义,与其说是提供了“文章经国”的口号,毋宁说是促使日本文人开始思考“文”及“文学”的本质与功用,从理论上开启了日本汉文学的鼎盛时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长安都市景观在日本古代文学中的衍生与流变研究”(批准号15CWW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可参考 Wiebke DENECKE:『嵯峨朝における「文章经国」再論』(『アジア遊学』2013年3月(162)号,第93—10页)、滝川幸司:『経国の「文」:「典論」「論文」の受容と勅撰集の成立』(收入河野貴美子『日本「文」学史』第1冊,第338—377页,東京勉誠出版2015年版)中对学术史的梳理。另外,池田源太、小島憲之、松浦友久、金原理、後藤昭雄、波戸岡旭、半谷芳文、大曾根章节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日本“文章经国”思想的实质、变迁与原因。

[2] 参考 Jason Webb. *In Good Order: Poetry, Reception, and Authority in the Nara and Early Heian Courts*.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5. Gustav Heldt. *The Pursuit of Harmony: Poetry and Power in Early Heian Japan*. Ithaca: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008.

[3] 小島憲之较早指出曹丕的“文章经国”论于日本而言恐怕只是一种观念上的“借用物”。详见小島憲之:『国風暗黒時代の文学 中(上): 弘仁期の文学を中心として』,第753—761页,東京塙書房1986年版。

[4] 图片参考佐佐木信綱等编:『南京遺文・南京遺芳』第29篇图,東京八木書店1987年版。相关研究参考静永健:『日本八至九世紀考古文献所見〈文選〉断简考』,详见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九辑》,第18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5] 東野治之:『正倉院文書と木簡の研究』,第149—152页,東京塙書房1977年版。

[6][7][20][38][43][44][47][51] 参考塙保己一編:『羣書類從 第8輯 装束部・文筆部第1』訂正版,第449页,第490页,第490页,第491页,第491页,第

424页,第490页,第491页,東京統群書類完成会1960年版。

[8][21][23][48] 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第163页,第1页,第1页,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9]『续日本后纪』卷12承和9年10月丁丑菅原清公薨传。

[10] 即萧该《文选音义》、曹宪《文选音》、许淹《文选音义》、公孙罗《文选注》《文选音》、李善《文选注》《文选辨惑》《文选音义》、五臣《文选注》、陆善经《文选注》。

[11][42] 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详考》,第2007—2027页,第505—5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12] 汪习波:《隋唐文选学研究》,第2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3]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白化文等校注,第80页,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14] 参考《令集解》卷廿二“考课令”,《令集解》卷17“选叙令”。

[16]『延喜式』卷18“式部上”。皇典講究所编:『延喜式』上卷,第664页,東京臨川書店1992年版。

[17]『文德天皇实录』卷8齐衡3年4月庚寅条。

[18] 藤原克己:『文章経国思想から詩言志へ——勅撰三集と菅原道真』,『国語と国文学』57号,第12—23页,1980年11月。

[19] 大曾根章节、金原理、后藤昭雄等校注:『新古典文学大系27·本朝文粹』,第273页,東京岩波書店1992年版。

[22][35]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第61页,第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24]『续日本后纪』承和14年10月26日有智子内亲王薨传。

[25] 参考後藤祥子編:『王朝文学と斎宮・斎院』,第469—470页,東京竹林舎2009年版。

[26][39] 刘勰既肯定了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论说以及对“文人相轻”弊病的批评,但也提出了“魏典密而不周”的观点。参考刘勰:《文心雕龙》,第575页,第576页,中华书局2012年版。

[27] 参考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44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2册《魏晋南北朝卷》,第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蔡英俊:《曹丕〈典論論文〉析論》,《中外文學》1980年第12期;王梦鸥:《曹丕典論論文索隱》,《中外文學》1980年第10期。

[28] 滝川幸司:『勅撰集の編纂をめぐって:嵯峨朝に於ける“文章経国”の受容再論』,『アジア遊学』188卷,第

24—36页,2015年第9期。

[29] 参考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第146—1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崇智:《人物志校笺》,“前言”第2页,巴蜀书社2001年版。

[30][41][50] 参考松浦友久:『日本上代漢詩文論考』,第36—37页,第239—241页,第26页,東京研文出版2004年版。

[31] 後藤昭雄:『平安朝漢文學史論考』,第34—36页,東京勉誠出版2012年版。

[32] 小野泽精一等编:《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与人的观念的发展》,李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3]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册),第29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4] 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第68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1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36] 王向远:《气之清浊各有体——中日古代语言文学与文论中“气”概念的关联与差异》,第26—27页,《东疆学刊》2010年第1期。

[37] 赤塚行雄:『“氣”の文化論』,第65—68页,東京創拓社1990年版。

[40]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第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5] 参考吉田幸一:『懷風藻と文選』,『国語と国文学』第9卷12号,1932年12月;辰巳正明编:『懷風藻——漢字文化圈の中の日本古代漢詩』,東京笠間書院2000年版。

[46] “神代文字”之说在江户时期跡部光海『和字传来考』、僧諦忍『伊吕波问辯』、鹤峰戊申『楔木文字考』等学者的著述中进一步被理论化和体系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江户国学者平田笃胤(1776—1843)的『神字日文传』和『日文传附录』。参考魏樸和(Wiebke DENECKE):《追溯日本文学的起点——以〈怀风藻〉和〈古今和歌集〉为例》,第32—35页,《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年第5期。

[49] 卢盛江:《空海的思想意识与〈文镜秘府论〉》,《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吴子林